

一、李克強訪日及近期中日關係發展評析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蔡東杰主稿

- 中、日互動於 2012 至 2016 年一度陷入低盪緊張，惟雙方具互賴性，不可能長期對峙，中日關係發展勢將牽動未來區域局勢。
- 基於彼此關係之複雜敏感度，此次中、日互動之象徵意義仍高於實質，雙方未來是否能針對「釣魚臺爭議」等矛盾真正達成共識，仍有待觀察。

（一）中日關係邁向「二度融冰」發展

新世紀初以來，尤其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在 2001 年參拜靖國神社後，中日關係便進入跌宕起伏階段。儘管安倍晉三於 2006 年首度組閣後，隨即對北京進行「破冰」之旅，在 2007 年福田康夫與溫家寶接力「融冰」與「迎春」之旅後，最終因胡錦濤在 2008 年對日進行「暖春」之旅，在共同慶祝「中日友好和平條約」30 周年之餘，也宣告兩國關係結束了一段低盪階段。

其後，以 2010 年中國大陸漁船與日本艦艇相撞事件揭開序幕，在日本於 2012 年實施「釣魚臺國有化」後，中日關係隨即在政治、經濟、文化各層面同時急速降至冰點。再加上 2012 年再度執政的安倍晉三，因為參拜靖國神社、配合美國重返亞太、解禁集體自衛權等政策立場均與北京存在衝突，致使雙邊互動再度陷入長期低迷狀態。

儘管如此，畢竟中日兩國地緣鄰近且關係盤根錯節，以共同接受「釣魚臺問題存在不同意見」為開端，雙方雖一度推動習近平與安倍在 2014 年 APEC 峰會期間會面，但彼此歧見仍大，何況美日還在 2015 年推動以深化同盟為目標之新防衛指針，不過，由於中日在同（2015）年恢復了包括安全對話、國會交流與執政黨互動等溝通機制，仍舊埋下某種伏筆。尤其自 2017 年起，例如派遣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出席北京「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等，在日本不斷釋放和解訊息後，李克強於 2018 年訪日，則不啻是北京對此做出之正面回應。

（二）李克強訪日行之主要意義與成果

2018 年恰逢「中日友好和平條約」簽署 40 周年與中日韓三邊高峰會 10 周年，繼 2011 年溫家寶赴日出席中日韓高峰會後，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再度以同一理由訪日，一般認為不僅是中日關係回暖之重要指標，更可能藉此為習近平訪日鋪路。除此之外，由於中、韓兩國領袖都是時隔 7 年再度訪日，三邊高峰會也是時隔 2 年半後再度召開，加上半島議題浮現重大轉機，此次會晤自然引發各方關注。

早在今年 4 月 15 日，包括中共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財政部長劉昆、商務部長鍾山，以及由中央軍委國際軍事合作辦公室副主任慈國巍率領的軍方參訪團，便同日抵達日本訪問，密集程度引人側目；甚至李克強也在 5 月 8 日飛抵東京同一天，投書「朝日新聞」，以「推動長期穩健之雙邊關係」進行輿論戰。在日期間，除接連會見首相、參眾兩院議長、天皇，以及執政與在野黨主要領袖之外，並出席了中日韓高峰會與中日「省長知事論壇」等會議，除 3 國達成朝鮮半島非核化、貨幣互換與加速推動區域經濟合作等共識外，中日兩國亦就洽談達 11 年的海空聯絡機制達成協議，並研議放寬核災地區食品銷往大陸限制，同時推動日本參與「一帶一路」合作倡議之可行性研究。

（三）下一階段中日關係前景評估

相較 2012 至 2016 年中、日再度陷入緊張關係，推究近期趨於緩和的原因，除雙方因彼此互賴，本即不可能長期對峙外，日本因「安倍經濟學」終究無助走出經濟陰霾，加上美國總統川普上台後，由於力推保護主義以致帶來不確定性，尤其退出 TPP 一事，或可視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值得注意的是，中、日雙方雖自 2007 年安倍首度組閣任內，開始商議海空聯絡機制以防止潛在之偶發衝突，但因無法釐清釣魚臺周邊之適用規範，始終難以取得共識，如今則達成協議雖被安倍視為重要外交成果，面對中國大陸自 2012 年以來逐步落實「常態通過」，此舉或意味日方做出妥協。當然，釣魚臺領土爭議能否真因此獲得緩解，仍將成為觀察指標。

其次，李克強此次雖未直接放寬日本食品輸入大陸的限制，但同

意兩國成立協議機制展開研究，一般認為，最終鬆綁或也僅是時間問題，由於自 2011 年以來，目前全面禁止日本核災地區食品進口者僅剩臺灣與中國大陸，倘若北京方面決定放行，非但臺灣將處境尷尬，尤其李克強此行特別針對臺灣問題，要求日本方面遵守「雙方長期共識」，其後續發展對臺日關係乃至兩岸互動之影響，絕對不容小覷。

二、近期兩岸地方交流概況觀察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蔡中民主稿

- 我地方首長赴陸交流，以無黨籍和國民黨籍縣市長為主，多以促銷觀光、城市治理經驗交換為目的，少觸及政治議題。
- 近期中國大陸地方官員來臺交流甚少，今年雙城論壇陸方來臺官員具指標性。
- 兩岸交流呈現「官冷民熱」趨勢，地方交流次數減少但未歸零，而政黨交流、民間互動仍持續進行。

（一）近期臺灣地方首長赴陸交流

當前正值兩岸之間的官方互動相當有限之際，地方政府及民間與中國大陸的往來便成為評估兩岸關係的一個重要指標。我們可以從兩個主要面向加以觀察，亦即臺灣地方官員赴陸參訪與中國大陸官員來臺交流；此外，也可參考非官方面向的政黨交流與民間互動的狀況。首先是臺灣地方政府官員赴陸參訪，依據移民署統計資料顯示，今年至五月為止，有七位縣市首長（連江縣長劉增應、金門縣長陳福海、花蓮縣長傅崐萁、臺東縣長黃健庭、苗栗縣長徐耀昌、新北市長朱立倫、南投縣長林明溱）曾去過大陸各地交流，總計十一次，跟去年下半年（七月至十二月）間的十九次相比較少，出訪官員的差別也僅有臺北市長柯文哲（2017年7月1日至3日）與新北市長朱立倫（去年下半年未出訪中國大陸）。從個別次數來看，以花蓮縣長傅崐萁的四次最多，連江縣長劉增應的三次居次，再者是金門縣長陳福海的兩次，其餘各一次。就政黨屬性來看，除傅崐萁縣長與陳福海縣長外，其餘皆為國民黨籍。而距今最近一次民進黨籍縣市長赴陸為2015年4月時，澎湖縣長陳光復赴山東、河南與北京等地交流；再往前推則是2014年6月前臺南市長的賴清德去上海，以及2013年前高雄市長陳菊訪問天津、深圳等地。經驗資料顯示，兩岸之間的地方交流，無論執政黨或是兩岸關係為何，基本上都是以無黨籍與國民黨籍縣市長為主。若從參訪目的來看，主要還是以促銷觀光產業為主軸，輔之以交換城市治理經驗，較少觸及政治性議題。在過去五個月的十一次地方政府赴陸交流中，只有林明溱縣長與傅崐萁縣長曾拜訪

國臺辦並與主任劉結一會面，其餘都僅與中國大陸的地方政府官員互動。

（二）近期中國大陸地方官員來臺交流

其次，關於中國大陸官員來臺訪問交流，5月底有南京市委書記張敬華訪臺一周，走訪臺北、新北、新竹、臺中與金門等地；除此之外，還有具副部級身分但並非政府官員的南京大學前黨委書記洪銀興與該校副書記朱慶葆，來大學校園談一帶一路與網路經濟發展。然依據移民署統計資料顯示，在此之前，上次中國大陸地方官員訪臺已是2017年4月底，距今已一年多，當時是江蘇省委副書記吳政隆率團考察臺灣企業的發展並與企業家們見面。反觀2015年10月以前，中國大陸省級政府官員訪臺活動相當頻繁（2013年1月至2015年10月之間，僅2015年2月沒有相關活動），但其後至目前為止僅有四次（2016年3月及4月與2017年3月與4月各一次），來訪者為前重慶市副市長翁杰明與沐華平、前河南省副省長王鐵、江蘇省省委副書記吳政隆。接下來值得觀察的一個重要指標莫過於臺北市與上海市之間的雙城論壇（2010首次舉辦，至今共計八次），兩個城市交替舉行，今年輪臺北市主辦（至今在臺北舉辦過四次，來訪官員分別是2010年上海市長韓正、2012年上海市副市長姜平、2014年上海市副市長屠光紹、2016年上海市委常委暨統戰部長沙海林），但由於諸多因素影響，目前仍未最後確認，最終是否能順利舉行以及陸方會派哪位官員參加，都對後續的地方交流深具指標性。

（三）趨勢觀察

近期兩岸地方交流的情況相較之下呈現幾項趨勢：一、臺灣官員代表皆為地方首長，而中國大陸官員為地方副首長；二、臺灣訪陸遠較中國大陸訪臺頻繁；三、以促銷觀光為主要目的；四、臺灣訪陸的官員與中國大陸中央政府官員接觸較少；五、金門縣長與連江縣長主要訪問對象是鄰近的福建省，並未去訪其他各地。以上這些現象主要是反映兩岸關係目前的處境，因為中央層級互動少，連帶影響地方層級的交流。當然吾人亦可反向思考，雖然互訪次數減少，但尚未完全歸零，顯示兩岸間的地方官員仍有意願來往，維持基本的互動。

在地方官員交流之外，還值得注意的是政黨之間的交流與民間的互動，例如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兩岸論壇」（原名「兩岸經貿文化論壇」，自 2006 年開始至今已舉辦過十屆），以及 5 月初的臺北國際觀光博覽會（中國大陸有十五個省市參加），還有一些宗教與學術交流活動都持續進行中。總體來講，近期兩岸地方交流是「民間熱、官方冷」；而官方部分，地方政府又較中央政府來得熱絡。在兩岸中央官員尚未建立起足夠的互信與建置暢通的溝通管道之前，類此模式恐怕還會繼續好一段時間。然而，只要兩岸不中斷交流，或許當前「由下而上」的互動機制亦能發揮功效，提供雙方官員思考決策的基礎，在相互展現善意的情況下，重新開啟協商的大門。

三、首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與經濟發展影響簡析

國立政治大學兩岸政經研究中心主任魏艾主稿

- 「首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具有建立中國大陸信息化發展政策平台、電子政務和數字經濟發展成果展示平台，及數字中國建設理論經驗和實踐交流平台等三大功能。
- 數字經濟已成為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新動源。2017 年大陸數字經濟規模達 27.2 兆元人民幣，佔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達 32.9%，同比增長 2.6 個百分點，對 GDP 的貢獻接近 60%。
- 大陸數字經濟總體規模已居世界第二，但其實質內涵與已開發國家仍有相當落差，中共「十九大」所提出建立網路強國的發展目標，仍面臨互聯網關鍵設施和大部份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的困境。

近年來，中國大陸在市場經濟驅動和政府政策引導雙重影響下，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新經濟不斷推陳出新，其快速發展超出預期，移動支付、大數據、雲計算、「互聯網+」等帶動產業革命與產品創新。數字化已是新時代中國大陸國家信息化的新戰略，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領域信息化建設，在推動大陸經濟社會發展、促進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以及滿足人民生活需要方面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今（2018）年 4 月下旬中共在福建省福州市舉辦「首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展現網路信息建設的成果，相關部門亦提出今後各領域的發展政策方向。然而，在繼續推進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如何克服中國大陸核心技術缺失、創新力不強、監管體制不完善等問題，將是網路信息建設能否順利推展，並成為大陸經濟社會發展動力的關鍵所在。

（一）建設創新型國家下的數字經濟

自中共「十八大」以來，數字中國建設便已是中國大陸重要的經濟發展策略。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下，便是要藉創新驅動發展策略，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核心技術取得重大突破，自主創新能力全面增強，邁進創新型國家和人才強國行列（「中

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2016年3月)。在拓展網路經濟空間方面，則是要實施網路強國戰略，加快建設數字中國、推動信息技術與經濟社會發展深度融合，加快推動信息經濟發展壯大。在具體科技領域項目上，主要為完善新一代高速光纖網、構建無線寬帶網、積極推進第五代移動通信(5G)研究，發展現代互聯網產業體系、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等。

「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綱要」和「十三五國家信息化規劃」，確定了數字中國建設發展的路線圖和時間表；信息領域部份核心技術創新突破，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等前沿技術研究加快，量子通信、高性能計算取得重大突破；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實現跨越式發展，建成了全球最大固定光纖網路、4G網路的發展目標(「『數字中國』進入快車道」，瞭望新聞周刊第18期，2018.4.30)。

中共「十九大」報告中將「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作為數字經濟發展的新戰略與新方向(「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報海外版，2017.10.28)。習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也強調，推動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加快完善數字基礎設施，推進數據資源整合和開放共享，保障數據安全，加快建設數字中國，更好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著眼於數字經濟發展實際情況和未來發展趨勢，打造中國數字經濟升級版勢在必行(李勇堅，「壯大數字經濟的中國路徑」，瞭望新聞周刊第17期，2018.4.23)。

除了長期目標的設定外，數字經濟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主要內容。今(2018)年3月「兩會」期間，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強調，「做大做強新興產業集群，實施大數據發展行動，加強新一代人工智能研發應用，在醫療、養老、教育、文化、體育等多領域推進『互聯網+』；發展智能產業，拓展智能生活，建設智慧社會；運用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大力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加大網路提速降費力度，實現高速寬帶城鄉全覆蓋，擴大公共場所免費上網範圍，明顯降低家庭寬帶、企業寬帶和專線使用費用，取消流量『漫遊』費，移動網路流量資費年內至少降低30%，讓群眾和企業切實受益，為數字中國、網路強國建設加油助力」(李克

強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光明日報，2018.3.23)。

(二) 從「數字福建」到「數字中國建設」的發展

為貫徹中共「十九大」關於建設網路強國、數字中國、智慧社會的發展策略和目標，「首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於今(2018)4月21至23日在福建福州舉行。峰會圍繞「以信息化驅動現代化、加快建設數字中國」主題進行探討。在此一主題下，峰會設置主論壇以及智慧社會、電子政務、數字經濟、數字海絲、新型智慧城市、數字福建、互聯網等8個分論壇進行探討。根據中共設定的目標是要將此項峰會定位為中國大陸信息化發展政策發佈平台、電子政務和數字經濟發展成果展示平台、數字中國建設理論經驗和實踐交流平台。

這場屬中國大陸內部信息化領域高規格的盛會，有網路信息領域政府部門代表、企業精英、專家學者共800多人出席。中國大陸互聯網界巨頭百度、阿里巴巴、騰訊、華為、京東等悉數出席。

習近平在賀信中指出，「當今世界，信息技術創新日新月異，數字化、網路化、智能化深入發展，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習近平強調，2000年在福建工作時，作出了建設數字福建的部署，經過多年探索和實踐，福建在電子政務、數字經濟、智慧社會等方面取得長足進展（「習近平：推動信息化更好造福社會造福人民」，人民日報海外版，2018.4.23）。誠然的，從習近平在福建省省長任內率先提出建設「數字福建」，以福建省作為示範區，先行先試，並逐步建設「數字中國」有其深切的意涵（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數字福建』建設的重要啟示—習近平同志在福建推動信息化建設紀實」，人民日報，2018.4.20）。這期間，中國大陸每一個人的生活細節都閃動著「互聯網+」。手機支付寶、共享單車、網購等已經成為人們不可或缺的生活工具。製造業、零售業、旅遊業等傳統行業，也因「互聯網+」而煥發新的生機。「互聯網+」已成為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新引擎，推動傳統產業升級轉型，並創新方便智能的政府業務，增加並提供新型教育服務和民生醫療照護。

以電子政務為例，根據大陸的統計，截至2017年12月，中國大陸在線服務用戶規模已達4.85億，全大陸超過七成政府網站建有政

務微信，超過五成建有手機 APP；政務微博超過 17 萬個，2017 年發博總數超過 8000 萬條；截至 2017 年 9 月底，全大陸有 364 個城市、縣域透過支付寶為居民提供政務服務，服務種類達到 100 多項（「電子政務與你『零距離』—看平台升級如何改善服務體驗」，人民日報，2018.5.17）。

（三）數字經濟發展對大陸經濟增長的貢獻

大陸數字經濟規模由 2014 年的 16.16 兆元(人民幣)、2015 年 18.63 億元、2016 年 22.58 億元和 2017 年 27.17 億元，佔 GDP 的比重分別為 26.10%、27.50%、30.30%和 32.90%（「數字中國建設升級、智慧城市 3.0 整裝待發」，21 世紀經濟報導，2018.4.24），其中 2017 年的同比增長 2.6 個百分點，對 GDP 增長的貢獻接近 60%（李勇堅，「壯大數字經濟的中國路徑」，瞭望新聞周刊，2018 年 4 月 23 日第 17 期，頁 32-33）。全年大陸數字經濟領域就業人數達 1.71 億人，佔當年就業總人數的 22.1%，已成為吸納就業的重要渠道。如今，中國大陸已成為全球最大的移動互聯網市場。截至 2017 年 12 月，大陸網民規模達 7.72 億，互聯網普及率 55.8%。巨大的用戶市場帶動了互聯網領域的各種創新，這些創新將使人們的生活更加精細化、智能化、網路化，為建設一個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智慧中國鋪陳良好的條件（「『互聯網+』促千行百業轉型升級」，人民日報海外版，2018.4.20）。

近年來中國大陸數字經濟或新經濟的快速發展，有政策引導和市場驅動雙重因素的影響。在政策引導方面，自 2014 年中共提出網路強國建設後，便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網路強國政策。在過去 4 年多的時間，大陸在集成電路、操作系統、網路攻防安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核心技術領域陸續取得突破。此次首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安排有政策發佈項目，相關部門分別發佈了「數字中國建設發展報告（2017）」、「全國醫院信息化建設標準與規範」、「新時代數字福建『151』衛星應用示範工程」等一系列政策，而數字中國研究院和數字中國核心技術產業聯盟正式成立，將進一步凝聚數字中國建設方面發揮作用。

在市場驅動方面，中國大陸數字經濟企業的發展其主要基礎便是快速增長的用戶量，使互聯網營銷能在此一紅利上快速崛起。在新經濟蓬勃發展的同時，其對大陸經濟的帶動作用主要表現於：1. 戰略新

興產業的快速成長。2. 新產品的增長遠遠領先於傳統產品。3. 新興服務業快速成長。4. 網上零售屢創新高（沈建光，「新經濟對中國經濟帶動作用日益顯現」，財經雜誌，2018.3.19）。

中國大陸數字經濟總量規模持續擴張的同時卻也存在著發展不均衡的情況。從區域發展看，2017年，廣東、江蘇、山東數字經濟規模突破2兆元（人民幣），三省數字經濟總量佔全大陸數字經濟總量1/3，而西北地區（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數字經濟總體規模僅10762億元，僅佔全大陸數字經濟規模總量的4%。東北老工業基地（遼寧、吉林、黑龍江）為14393億元，僅相當於全大陸的5.3%（李勇堅，「發展數字經濟，均衡是關鍵」，人民日報海外版，2018.4.27）。從產業看，數字經濟在三大產業的滲透率不斷加深，但行業差距大。2015年農業、工業和服務數字化率分別為4.9%、14.20%和23.10%；2017年則分別為6.50%、17.20%和32.60%（21世紀經濟報導，2018.4.24）。

（四）大陸數字經濟發展目標及面臨的問題

數字經濟的快速增長已成為大陸經濟發展的新動源，其總體規已居世界第二，但是中國大陸數字經濟佔GDP的比重（32.9%）與已開發國家仍有較大的差距。2016年德國、英國、美國數字經濟佔GDP比重分別為59.3%、58.6%和58.3%，數字經濟在其GDP中已佔據主導地位（李勇堅，「壯大數字經濟的中國路徑」，瞭望新聞周刊第17期，2018.4.23）。很顯然的，大陸的數字經濟仍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

中共「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建設網路強國的目標。根據「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綱要」，網路強國的主要衡量指標涉及固定寬帶家庭普及率、移動網路覆蓋率、信息消費總額、電子商務交易規模，以及關鍵技術的里程碑等。其中，按照中共的規劃，有關網路強國的目標進程，到2020年，核心關鍵技術部份領域要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到2025年，根本改變核心關鍵技術受制於人的局面，湧現一批具有強大國際競爭的大型跨國網路信息企業（「乘勢而上，發力建設網路強國」，人民日報，2017.11.27）。近年來數字經濟的快速增長，大陸已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互聯網網民群體，在電子商務、網路社交、網路搜索、網路金融等領域，也擁有一批世界一流的互聯網應用，但是從網路基礎設施、

網路信息技術角度看來，大陸離網路強國還有一定的距離。

明言之，中國大陸網路基礎設施人均水平不高，互聯網關鍵基礎設施以及大部份核心關鍵技術受制於人的根本情況並沒有改變，再加上，國際信息通信設施能力和空間網路設施全球服務能力不足，是網路強國建設必須克服的難關。其中，網路信息技術部份核心器件對外依存度過高，產業風險大。

以中國芯片為例，芯片作為技術、資本和高端人才密集的產業，數十年以來受歐美日韓的掌控。儘管近十年來中國大陸芯片產業有很大的進步，但目前中國大陸在高端 CPU 和存儲方面與歐美仍存在較大差距，尤其是製造芯片的設備和原材料等方面缺陷明顯。此外，從事芯片的研發人才嚴重不足，缺乏富有專業經驗的高端人才，這些都將制約中國大陸芯片產業的發展，進而影響網路強國目標的順利推展（「中國芯片待醫、缺技術缺人才」，大公報，2018.5.8）。此外，在數字經濟逐步發展進程中，相關的數據立法、電子商務立法等滯後，也將制約互聯網營銷的健康發展。

四、南北韓領袖峰會及近期韓半島情勢發展觀察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劉德海主稿

- 北韓面臨國際局勢改變的不利情況，金正恩亦有完成富國強兵的雄圖大略，促使平壤主動提議南北韓領袖峰會。
- 平昌冬奧為南北韓關係改善契機，板門店領袖峰會後南韓輿論對金正恩好感度大增，熱烈討論多項經濟合作議題。
- 美國和北韓對川金會實現營造正面樂觀氣氛；倘北韓棄核後，韓半島發展將以經濟優先，美國影響力或式微，而中國大陸則具地緣政經和戰略優勢。

（一）國際情勢改變促使北韓主動提議南北韓領袖峰會

文金峰會雖非兩韓首度峰會，但卻意義重大，且可能對東北亞帶來巨大的改變。此次峰會與前兩次峰會（2000年與2007年）最大不同點是北韓是主動提議者，而前兩次南韓皆為主動倡議者。此次北韓之所以採取主動最主要原因是金正恩所面對的國際環境不同於其父金正日時代的國際情勢。而更重要的是金正恩有雄圖大略，試圖完成祖父與先父未竟的大願，即完成構建核武導彈連結的戰略武器，並與美日建交，使朝鮮半島的局勢由目前對南韓有利扭轉為北南平衡的狀態，終而使北韓成為富國強兵的大國。易言之，金氏王朝有三大任務，第一是構建核導彈，以獲得政權安全保障。第二項任務與美日建交。第三項任務即是將「朝鮮」建設成為經濟強國。

就北韓而言，朝鮮半島出現對平壤不利的變局是因陸美有交集利益，兩強都將北韓無核化視為優先政策，並攜手合作對北韓施壓。2013年習近平主政以來，將構建與美國的新型大國關係視為首要外交政策目標，試圖藉「中美共治」朝鮮半島危機來型塑與構建與川普政府新型大國關係，因而中國大陸不同以往地迄今已三度支持美國在聯合國推動對北韓日益嚴格的經濟制裁。大陸是北韓最大的貿易夥伴與最重要的經援來源，北京加入國際經濟制裁對金正恩政權造成致命的壓力。再者，川普去年就任美國總統後放棄歐巴馬對北韓的戰略耐心策略，改採極限施壓而後交往的新策略，企圖突破前幾任總統都無法解決的外交困境，助其得以在2020年成功連任。此外，川普的充滿不

確定性的多變個性與極為逼真的軍事威脅，亦讓金正恩憂心美國真打算對北韓動武。

（二）平昌冬奧為南北韓關係改善契機

金正恩在面對前所未有的 G2 的壓力，以及川普政府威脅要以武力完全摧毀北韓下，決定對南韓打民族主義牌，利用在今年新年賀詞強調兩韓同一民族的感情，主動宣布派團參加在南韓平昌舉行的冬季奧運。更特別派親妹妹金與正為特使訪問首爾，表示對文在寅政府修好的真誠，並提議兩韓峰會。對金正恩而言，只有當兩韓是真正主人公時才能破解陸美壓制。換言之，文金會重點就是改善兩韓關係，兩韓合作就是對美國談判的籌碼。對南韓言堪稱是望穿秋水，終於得到北韓的正面回應。之前文在寅政府曾至少兩度向北韓提議舉行軍事會談、降低朝鮮半島緊張情勢都為得到回應。而當川普和金正恩在比「誰的（核武按鈕）大」時，令南韓焦慮朝鮮半島情勢失控。而平昌冬奧終為兩韓帶來春天，也為南韓得以在朝鮮半島事務取得主導地位。結果，南韓輿論對北韓的觀點有明顯的轉變。兩韓 4 月 27 日舉行歷史性峰會後，最新民調顯示韓國民眾對金正恩大為改觀，對他表達信任的人數占比從原本 10% 來到 78%。南韓國內的保守派或自由派媒體都已開始討論未來兩韓經濟合作的可能，如板門店宣言所提及重新修建兩韓間的鐵公路（京義線與東海線），重啟開城工業區，共同開發北韓境內的稀土、重新討論兩韓與俄羅斯間的天然氣管道，以及文在寅向金正恩提出以朝鮮半島三個經濟帶為基礎的「新經濟地圖倡議」，開發北韓的西海岸經濟區吸引外資，以及建設連接中國大陸大連、北韓羅先特別市與南韓忠清北道的高鐵等。

（二）川金會後續發展評估

金正恩的真正考驗是能否在未來的川金會達陣，成功地以棄核來換取建交。迄今北韓與美國皆表現強烈意願實現川金會，這是兩國間從未有過的現象。只要金正恩真願意棄核，川普是有可能與北韓建交的，這對這兩位領導人來說都是歷史上的大成就。選擇新加坡作為川金峰會的地點是川普堅持所致，因為他要扮演主角。金正恩同意前往

新加坡，展現他的勇氣與自信以及北韓願意接受與遵守國際規範。為製造正面氣氛，北韓釋放了扣押的3名美國人。而目前雙方仍有爭議的部分是儘管北韓強調逐步漸進棄核，兩方同步採取行動，美方要求朝鮮半島棄核越快越好，且表明將維持對平壤的高壓，直到北韓達到不可逆轉地棄核後才會給予平壤經濟回饋。川普單方面決定終止履行伊朗核協議是殺雞儆猴，試圖給平壤警告，必須真正棄核，甚至不排除包括長程飛彈發展的凍結。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表示若北韓迅速採取無核化的果斷措施，美國已準備好讓朝鮮實現美國的同盟國韓國那樣的繁榮。美國國務院高級政策企劃官胡克則直接表示將川普總統首屆任期內的2020年作為北韓完成無核化的時限。

雖然川金會仍有變數，但東北亞將很有可能因北韓核武危機獲得解決，而從目前戰略政治主導的局面，朝以經貿為主軸的發展趨勢，果真如此，對北京言是利多於弊，因為與美國相較，中國大陸佔有地緣政經與戰略的優勢，且其經濟實力雄厚，就中長期言居於優勢。本月李克強在日本的三國峰會上即已建議在聯合國安理會解除北韓經濟制裁後三方共同推動聚焦北韓之合作、減少貧窮、災難管理與能源環保的「中日韓+X」的新合作模式與架構，並以此作為構建亞洲發展的多邊平台。一旦東北亞走向以經貿為主的發展趨勢，東北亞區域經濟整合與亞歐經濟互動勢將加速，而北韓亦可能因此成為亞洲經濟投資客兵家必爭的處女地。金正恩3月北京行特別參觀有中國大陸資訊產業矽谷之稱的中關村，凸顯北韓企圖利用其地緣優勢，在未來希望著力於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使北韓得以從全球供應鏈的高端直接插入而躍起。儘管目前北韓迄今並未要求駐韓美軍撤離，但一旦北韓棄核後，朝鮮半島走向和平與經濟主導，美國對兩韓的影響力勢將式微，因為南韓對美國安全的倚賴驟降，尤其是兩韓致力於經濟互動與整合後更會變得明顯。

五、中共近期重要軍事演訓動態觀察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沈明室主稿

- 中共解放軍上半年偏重旅以下的基礎訓練，惟基於對臺武嚇需求，賦予相關軍事演訓高度政治意涵。
- 近期演訓係為軍改後組織調整之部隊重新建立戰力，而戰機遠訓係為熟悉航線、地形，另同時兼具戰略威懾效果。
- 南海閱兵非例行訓練，係形塑習近平個人權威；泉州火砲射擊係例行訓練，惟刻意宣布凸顯政治威懾效果。

（一）前言

從今年年初習近平主持年度訓練的動員大會後，解放軍各級部隊就已經開始不同層級的訓練與測驗，期望在最短時間內，不同軍兵種、不同層級部隊，除了執行特殊勤務外，都應該完成年度專業與聯合作戰訓練。因此，在今年的上半年，解放軍主要在旅以下的基礎訓練，偏重個人專業、單位能力整合、基礎戰術訓練等。但是基於對臺武嚇的需求，中共將這些演訓賦予高度政治意涵，期望對臺產生威懾效果。對臺灣而言，這些演訓不僅僅是中共對臺軍事行動的演練而已，也是一種精神疲勞轟炸，更是繃緊對手神經，形塑戰略威懾的手段。

（二）近期演訓

從媒體公開資料來看，近期演訓包括4月12日至5月14日的南海編隊巡航與海上作戰演練；4月18日的福建泉州火砲射擊；4月24至25日浙江舟山海域的艦隊防空演練；5月4日東部戰區73集團軍兩棲裝甲旅例行訓練等。另外，就是中共各型戰機及轟炸機所進行的遠海長航及繞島航行。雖然實際演習的課目及場次要比媒體公布要多，但是從這些例行訓練看來，其實仍在驗證解放軍在完成集團軍及合成旅的改編後，必須在最短時間內將歷經組織變革的部隊，重新建立戰力，讓調整後的個人及單位及早能夠熟悉武器系統使用及戰術戰法，以備在未來衝突中，足以擔任作戰的任務。

另就中共戰機遠海長訓及繞島航行而言，主要在針對遠程戰略轟炸的實際演練，熟悉航線與地形位置，同時兼具戰略威懾效果。因為中共的轟 6K 是由轟 6H 所改良，並且號稱「戰神」，自然有其戰略性功能與象徵意涵。尤其其所搭載的核武及遠程巡弋飛彈，可以在遠程進行突襲重要目標，在臺灣防空武器射程有限情況下，中共將會經常使用這些遠程戰略性武器進行繞島巡航任務。

可以想見，中共軍隊在今年會有例行性的訓練，不同部隊在各自演訓場及靶場所進行以測驗為取向的訓練。而這種例行性的訓練或演習，因為地點敏感性，或因為時機問題，在與某國際外交重大活動相互干擾下，時間刻意提前或延後，或選擇特定地點，以擴大演習的威懾與心戰意涵。

（三）戰略意涵

對中共而言，傳統對臺針對性演習主要由過去南京軍區與現在的東部戰區主導，因為臺灣及東海議題本來就是這個戰區的責任範圍。東部戰區有三界合同戰術訓練基地，可以完成戰區以下的各種專業訓練。如果要進行火炮射擊，可以到專屬火炮射擊的訓練地點進行。

如果要進行全軍性的測驗或是聯合演習測驗，也可以到內蒙古朱日和基地，進行測驗性的訓練，配合專屬的藍軍部隊，可以進行對抗性的演練。從朱日和訓練場地假想作戰地點以臺灣總統府附近地形來看，主要訓練目標在強化解放軍在臺北城市戰的能力。類似旅級對抗演習預計在今年 7 月以後展開，更值得注意的是，解放軍將參與印度與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組織後的第一次和平使命演習，將會派遣一支合成旅到俄羅斯參加演習，這支部隊現在正在加強組合訓練。

反觀中共在南海的大閱兵，媒體並未公布演習代號，表示並非例行性的系列演習，也看不出任何針對性的作戰想定。從其大規模動員三個艦隊及海上閱兵安排來看，其目的仍然是政治性的。就是在形塑習近平的軍事領導權威，強化習近平對海軍的掌握。現任海軍司令員沈金龍中將，係習近平破格由南海艦隊司令員升為海軍司令員，可見其他資深海軍將領不被習近平信任。在南海實施大閱兵，沈金龍擁有主場優勢，而且演習能夠兼顧習近平參加博鰲論壇的便利性，藉此伸

張南海主權，威懾其他聲索國。

中共雖對外強調南海演習並無針對性，但企圖透過宣傳可以對美國及南海周邊國家衍生政治效應。美國對此也心知肚明，所以派遣羅斯福號航母戰鬥群，進入南海海域，直搗中共海軍演習區域，迫使中共海上大閱兵後的演習草草結束，刻意讓中共凸顯南海主權的作為產生爭議。

另外，中共近期也在福建泉州灣進行實彈射擊軍事訓練，但並無演習代號，陸媒報導是陸軍航空兵實彈演習，以其射擊範圍的距離而言，比較偏向年度的驗證性訓練。正如 2015 年 9 月，解放軍也宣稱金門南部海域進行火砲實彈射擊，引發各界關注，明顯就是中共為因應臺灣進行總統選舉的警告；中共官方媒體刻意選擇特定時機宣布，凸顯其政治性意涵，警告意味濃厚。就中共而言，將例行性演習訊息擴大公布，當作警告性訊息，希望能讓對手政治性解讀而產生威懾效果，本來就是軍事演習的附加效益。這些作為就是一種「三戰」，也是軍事與政治聯合運用的作為，也是中共對外鬥爭的慣用手段。